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第106期）

中美关税谈判之后的外贸走向

主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承办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2025年6月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6期）

中美关税谈判之后的外贸走向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



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6期）

中美关税谈判之后的外贸走向

报告人：王孝松

2025年6月7日

最新进展

6月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

习近平指出，两国经贸牵头人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迈出了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问题的重要一步，受到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也证明对话和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最新进展

双方要用好已经建立的经贸磋商机制，秉持平等态度，尊重各自关切，争取双赢结果。对此，中方是有诚意的，同时也是有原则的。

日内瓦会谈之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美方应实事求是看待取得的进展，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

双方应增进外交、经贸、军队、执法等各领域交流，增进共识、减少误解、加强合作。

最新进展

特朗普表示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美中关系十分重要。

美方乐见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美中合作可以做成很多好事。

两国日内瓦经贸会谈很成功，达成了好的协议。美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实协议。
美方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

习近平欢迎特朗普再次访华，特朗普表示诚挚感谢。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继续落实好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会谈。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
第106期

目 录

- 1 特朗普2.0关税政策与中方反制**
- 2 中美联合声明发布后的贸易走向**
- 3 未来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及应对措施**
- 4 以高质量开放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特朗普2.0关税政策与中方反制

- 特朗普2.0时期的关税政策与中方反制
- 中美日内瓦联合声明是中方反制的阶段性成果
- 联合声明在短期的积极意义
- 联合声明在中长期的积极意义

特朗普2.0时期的关税政策与中方反制

时间	政策内容	中方反制
2025.2.4	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取消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关税豁免政策。此时美国对华关税均值为30.8%。	对美国能源进口加征15%关税，并对五种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此时中国对美关税均值为21.9%。
2025.2.10	在世界范围内，对钢铝产品征收25%的进口关税	
2025.3.4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中国输美商品的额外关税从10%上调至20%，涉及电子、机械、化工等广泛领域。此时美国对华关税均值为42.1%。	中国将对美国大豆、鸡肉、棉花等农产品加征关税，并对光学纤维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将10家美国企业例如不可靠实体清单。此时中国对美关税均值为22.6%。
2025.3.26	自4月2日起，在世界范围内对进口汽车整车征收25%关税，零部件关税最迟于5月3日生效。针对符合《美墨加协定》（USMCA）的汽车，仅对“非美国成分”部分征税。	

特朗普2.0时期的关税政策与中方反制

时间	政策内容	中方反制
2025.4.2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10%的“基准关税”，并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34%的“对等关税”，叠加此前因芬太尼问题征收的20%关税， 累计加征税率达54% 。	2025年4月4日，中国宣布自4月10日起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 加征34%关税 。
2025.4.7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中国未在4月8日前撤回报复性关税，美国将于4月9日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50%关税， 累计加征税率将达104% 。	2025年4月9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对美国加征50%关税。
2025.4.11	特朗普宣布对华关税从104%提高至125%（叠加20%关税）， 累计加征税率达145% ，并称“若各国90天内未达成协议，将恢复更高关税”。	自北京时间4月12日起，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 加征125%关税 。

中美日內瓦聯合聲明是中方反制的階段性成果

美方

取消共計
91%的加征關稅

暫停實施
24%的“對等關稅”

中方

相應取消了
91%的反制關稅

相應暫停實施
24%的反制關稅

联合声明在短期的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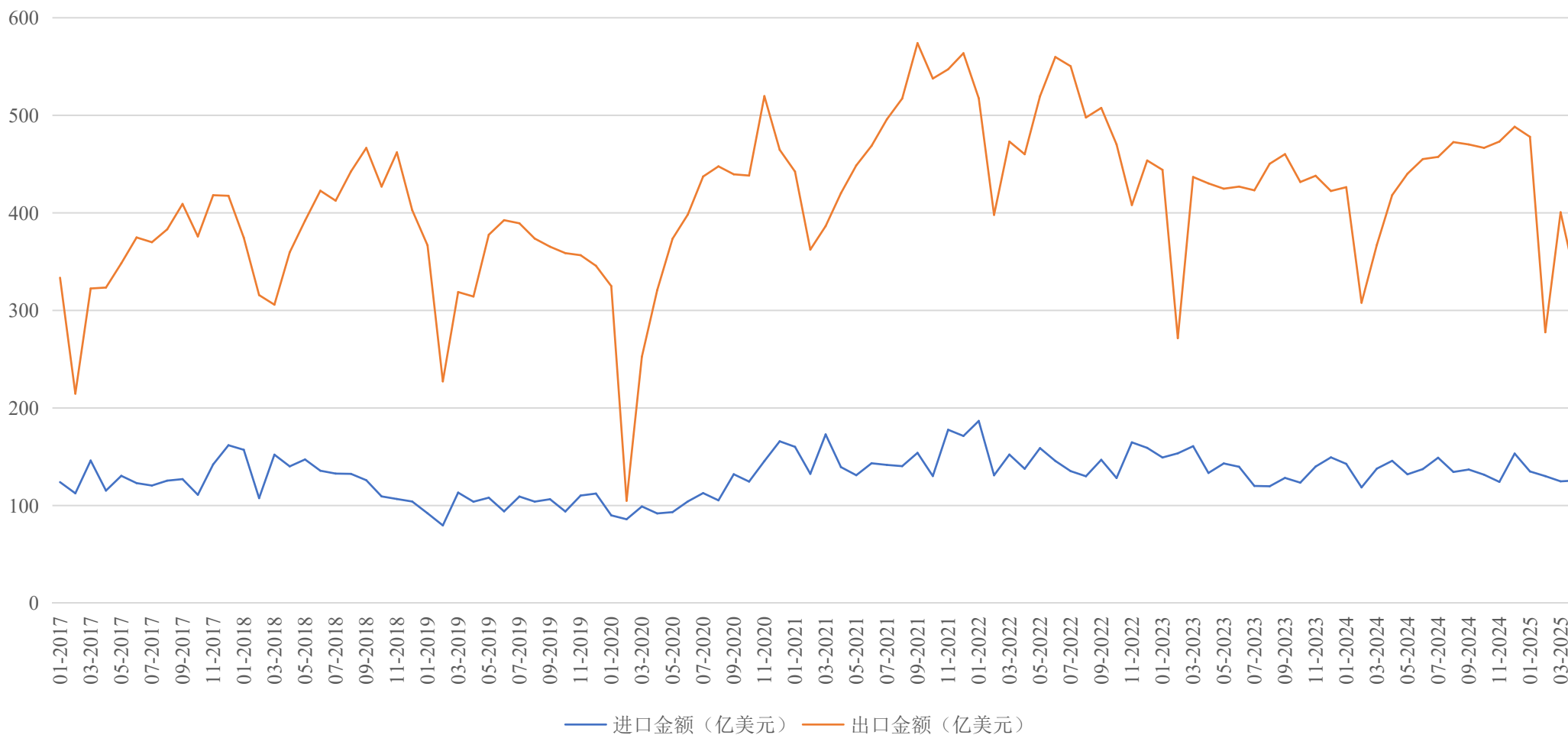
- 虽然关税没有全部取消，但大幅降低了双边关税水平，这就可以把之前暂停的中美贸易先恢复起来，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才有基础就更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 迈出了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重要一步，也为进一步弥合分歧和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谈判之前中国对美出口部分产品关税税率

■ 基准关税 ■ 2025年前加征的关税
■ 钢铁、铝和汽车行业关税 ■ “芬太尼”和“双反”



特朗普2.0关税对中国出口抑制效应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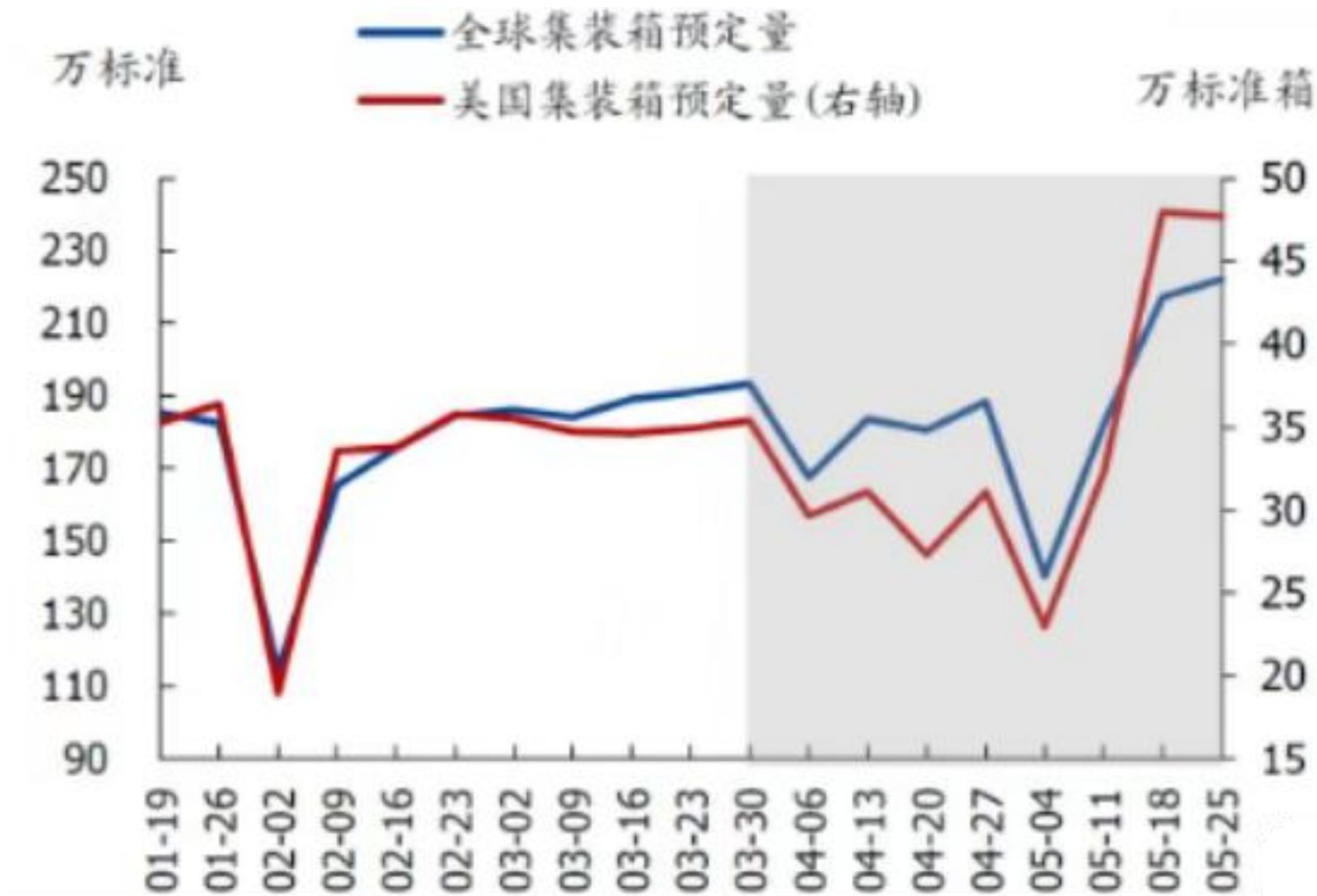
4月对美出口显著下降

- 从出口侧看，4月当月，由于超6成输美产品受到高额“对等关税”影响，我国对美国出口330.2亿美元**同比下降21.0%**，拉低总出口增速约3个百分点。
- 从进口侧看，自美国进口125.7亿美元，**同比下降13.7%**，拉低总进口增速约0.9个百分点。

联合声明在短期的积极意义

- 高频数据显示，中美发布经贸联合声明之后，全球贸易和美国进口环比大幅改善，5月全月仍同比小幅下降。
- 集装箱预定量：集装箱追踪数据软件商Vizion的周度数据显示，5月全球集装箱预定量环比增长5.8%，同比下降2.3%（4月同比下降7.3%）；美国集装箱预定量环比增26.6%，同比降2.3%（4月同比降12.8%）。

联合声明在短期的积极意义



联合声明在短期的积极意义

- 发布联合声明以来，中国对美出口高频数据大幅改善，出现“抢出口”状况，5月全月我国总出口同比预计增长5%左右。
- Vizion和物流平台FreightWaves数据显示，中美和谈后的两周，中国至美国航线的集装箱预定量较5月初低点大幅提升，超过了“对等关税”宣布前的水平，出现“抢出口”状况；5月全月中国至美国航线的集装箱预定量环比增长54.2%，同比降幅收窄至12.5%。

联合声明在短期的积极意义

- “抢转口”强度仍然较高，海运平台数据显示，5月越南港口到港、离港船舶数量同比分别增长23.0%、20.2%，连续创历史同期新高。
- 根据交通部统计数据，5月以来，我国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5%，环比增0.8%。
- 根据海运平台公布的日度船舶到港、在港、离港数据，5月我国离港船舶载重吨同比增1.5%，环比增2.8%。
- 从整体来看，5月的高频数据显示出我国出口具有较强的韧性。

联合声明在短期的积极意义



联合声明在中长期的积极意义

- 声明最后明确指出，中美双方将建立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核心含义是：中美双方将通过制度化的沟通机制，持续就经贸问题进行对话，以解决分歧。
- 未来可以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更加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为中美关系长期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联合声明在中长期的积极意义

- 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和贸易重要参与者，经贸关系缓和有助于稳定全球贸易秩序，为全球贸易健康发展注入稳定剂。
- 向国际社会传递了积极信号，展示了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有助于增强各国对自由贸易的信心，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自由的方向发展，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新动力和方向。
- 正如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彻底纠正单边加税的错误做法，不断加强互利合作，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共同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中美联合声明发布后的贸易走向

- 对两国经贸发展的总体影响
- 对重点行业贸易的影响
- 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走向

模拟方法

- 我们采用标准静态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进行模拟。
- GTAP是一个多地区、多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
- 我们使用GTAP第10版数据，设定多种场景，模拟出中美达成经贸协议对经济总量、贸易额、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

中美相互加征10%关税的影响

	GDP	出口	进口	贸易平衡	贸易条件	收入	社会福利
美国	-0.01	-0.13	-0.14	902.93	-0.02	-0.01	-793.76
欧盟	0.01	0.01	0.01	-561.46	0	0.01	372.26
中国	-0.04	-0.08	-0.14	840.85	-0.03	-0.04	-1628.29
日本	0.02	0	0.03	-202.83	0.01	0.02	120.39
越南	0.13	0.04	0.09	-117.62	0.05	0.14	122.22
韩国	0.02	0.01	0.02	-46.63	0.01	0.02	70.2
印度	0.02	0.01	0.02	-83.62	0.01	0.02	62.38
泰国	0.02	0.01	0.02	-22.12	0.01	0.02	24.49
瑞士	0.01	0	0.01	-11.39	0	0.01	-3.13
马来西亚	0.01	0.01	0.01	-5.12	0.01	0.01	15.18
印度尼西亚	0.03	0.03	0.05	-37.68	0.02	0.03	41.37
以色列	0.02	0	0.02	-19.35	0.01	0.02	10.85
南非	0.01	0.01	0.02	-10.81	0	0.01	6.9
菲律宾	0.03	0	0.02	-20.98	0.01	0.03	15.33
柬埔寨	0.15	0.08	0.1	-5.32	0.07	0.16	12.13
其他	0.02	0.01	0.02	-598.86	0.01	0.02	609.12

中美相互加征10%关税的影响

- 经济总量和收入方面，两国都呈现负增长，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略大于美国。
- 进出口贸易均受到抑制，两国都出现下降，但贸易平衡却表现为正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进口下降幅度相对更大。
- 两国贸易条件都有所恶化，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程度略高于美国。
- 社会福利是两国受影响最大的领域，且中国社会福利的下降幅度（1628.29亿美元）大于美国（793.76亿美元）。

对中国各部门的影响

行业	出口	进口	贸易平衡
谷物和作物	0.11	-0.31	22.69
畜牧业和肉制品	0.22	-0.52	11.32
自然资源	0.06	0.01	-35.9
加工食品	-0.03	-0.25	88.51
纺织及制衣业	-0.64	-0.42	-17.07
轻工业	-0.41	-0.61	-27.70
重工业	0.05	-0.15	22.71
公共事业与最终消费	0.18	-0.12	34.92
运输与通讯	0.08	-0.09	25.95
其他服务业	0.16	-0.09	20.69

对中国各部门的影响

- 农业部门和部分资源部门在出口增长或进口下降的带动下，贸易平衡普遍有所改善。
- 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受到关税的直接冲击最为严重，出口大幅下滑，导致贸易平衡显著恶化。
- 部分高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如电子、机械、汽车）虽然出口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进口下降幅度更大，其贸易平衡反而有所改善。

对中国各部门的影响

- 服务业总体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多数部门的贸易平衡有所改善，这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以及关税对其直接影响相对较小有关。
- 从整体来看，关税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促使相关产业调整，但对关键的出口支柱型产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对美国各部门的影响

行业	出口	进口	贸易平衡
谷物和作物	-0.19	-0.09	-10.07
畜牧业和肉制品	-0.38	-0.1	-79.28
自然资源	0.02	-0.02	67.57
加工食品	-0.14	-0.08	-12.94
纺织及制衣业	-0.39	-0.88	10.18
轻工业	-0.53	-0.25	-6.02
重工业	-0.11	-0.12	36.52
公共事业与最终消费	0.12	-0.06	31.91
运输与通讯	0.07	-0.04	19.88
其他服务业	0.09	-0.05	44.97

对美国各部门的影响

- 在互征10%关税下，美国各部门的出口普遍下降，但进口变化更为复杂（有升有降）。
- 总体而言，多数部门的贸易平衡有所改善，主要是由于进口下降的幅度大于出口下降，或者进口本身转为负增长，这与国内需求转向或进口替代有关。与此同时，部分关键制造业部门的贸易逆差扩大。

互征10%关税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对比

指标/部门类别	中国	美国	主要差异及原因
GDP	下降0.04%	下降0.01%	中国GDP下降幅度大于美国，表明中国经济受贸易摩擦影响更为严重
社会福利	下降1628.29亿美元	下降793.76亿美元	中国社会福利损失明显大于美国，原因在于关税对中国物价水平和出口导向型产业就业的冲击更为显著
农产品及食品加工	出口普遍增加，进口普遍下降，贸易平衡普遍改善。(例如：稻米、小麦、油料种子贸易平衡显著改善)	出口普遍下降，进口有增有减，贸易平衡多为改善。(例如：稻米、小麦贸易平衡改善，但油料种子、猪/家禽贸易平衡恶化)	中国农产品受益于关税，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平衡普遍改善；而美国农产品出口受损，贸易平衡改善是由于进口下降的相对作用。两国农产品在对方市场的竞争地位不同，关税改变了各自农产品市场结构。
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出口大幅下降，贸易平衡显著恶化。(例如：服装制造贸易平衡下降15.89亿美元)	出口大幅下降，进口更大幅度下降，贸易平衡显著改善。(例如：服装制造贸易平衡增加75.7亿美元)	中国作为这些产业的主要出口国，直接受到关税冲击，贸易平衡恶化严重。美国作为进口国，关税使其进口大幅萎缩，从而改善了贸易平衡，但消费者会支付更高价格

互征10%关税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对比

指标/部门类别	中国	美国	主要差异及原因
高科技/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如电子、机械、汽车)	有增有减，部分贸易平衡改善。(例如：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贸易平衡大幅增加73.91亿美元)	多数出口下降，贸易平衡有增有减，部分重要部门恶化。(例如：汽车制造贸易平衡下降11.37亿美元)	美国汽车制造业贸易平衡恶化较为突出，反映其供应链的全球化程度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中国部分高科技部门贸易平衡改善，可能受益于进口替代
服务业	普遍呈现贸易平衡改善	出口普遍下降，进口普遍增长，但多数贸易平衡改善	两国服务业在贸易平衡上都呈现改善趋势
矿业	贸易平衡普遍恶化	贸易平衡普遍改善	中国矿业贸易平衡恶化，可能因其对能源和矿产的进口依赖。美国矿业贸易平衡改善，可能反映其能源独立性或国内产能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走向

- 关税减免直接降低了贸易成本，企业利润空间得以修复。
- 苹果公司的iPhone生产线对华依赖度超过70%，关税调整可使每台设备成本降低5%-8%，全球零售价有望同步下调。
- 中国暂停非关税反制措施（如技术认证壁垒），将推动中美技术标准互认，加速5G和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整合。

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走向

- 联合声明提出建立“季度技术磋商+半年部长级会谈”机制，这一制度性安排显著增强了政策确定性。
- 这样可以使世界经济稳定性增强，跨国企业中长期投资决策的确定性提升。
- 特斯拉已宣布追加50亿美元在华电池工厂投资，而台积电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3纳米芯片生产线，意味着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加速。

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走向

- 协议中“第三国会谈机制”的设立（如选择新加坡或瑞士作为磋商地），为中美在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敏感领域的技术标准对话预留了空间，将会降低全球科技产业链分裂风险。
- 东南亚国家作为中美贸易“中间节点”，将受益于关税降低带来的区域物流成本下降。例如，越南电子组装企业的中国零部件进口成本预计下降15%，马来西亚棕榈油、泰国橡胶等对华出口渠道更趋稳定。
- 日韩等深度融入中美产业链的经济体，其汽车、半导体产业的跨境协作风险显著降低。

未来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及应对措施

- 美国从战略上遏制中国的目标未变
- 中美两国仍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坚持“零和思维”，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 尽管协议取得突破，但剩余10%的惩罚性关税仍影响约2000亿美元商品流动，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战略领域。

未来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及应对措施

- 5月13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指南，以所谓违反美出口管制为由，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禁用中国先进计算芯片，包括特定的华为昇腾芯片。
- 此外，美国国会可能通过立法手段干扰协议执行，例如推动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这一风险将使全球企业面临额外的合规成本。
- 地缘政治风险仍然突出。美国近期通过《巴拿马运河安全法案》，试图遏制中国在拉美的物流影响力，中美在关键战略支点的争夺可能外溢至经贸领域。

中美相互加征30%关税的影响

	GDP	出口	进口	贸易平衡	贸易条件	收入	社会福利
美国	-0.04	-0.4	-0.41	2708.8	-0.05	-0.04	-2381.29
欧盟	0.04	0.02	0.04	-1684.38	0.01	0.04	1116.78
中国	-0.12	-0.25	-0.42	2522.56	-0.1	-0.13	-4884.88
日本	0.05	0.01	0.08	-608.48	0.03	0.05	361.17
越南	0.4	0.12	0.28	-352.87	0.14	0.43	366.66
韩国	0.06	0.03	0.05	-139.89	0.03	0.06	210.6
印度	0.06	0.02	0.06	-250.87	0.03	0.07	187.14
泰国	0.06	0.02	0.05	-66.37	0.02	0.07	73.47
瑞士	0.02	0.01	0.03	-34.16	0	0.02	-9.38
马来西亚	0.04	0.03	0.04	-15.36	0.02	0.04	45.53
印度尼西亚	0.1	0.08	0.14	-113.03	0.05	0.1	124.12
以色列	0.05	0	0.06	-58.05	0.02	0.05	32.54
南非	0.03	0.02	0.05	-32.44	0.01	0.03	20.69
菲律宾	0.08	0.01	0.06	-62.93	0.04	0.08	45.98
柬埔寨	0.44	0.23	0.3	-15.95	0.21	0.47	36.38
其他	0.05	0.03	0.07	-1796.57	0.03	0.05	1827.36

中美相互加征30%关税的影响

- 负面影响显著加剧：GDP、出口、进口、贸易条件、收入和社会福利等各项负面指标的下降幅度，在30%关税情景下均显著扩大，基本是10%关税影响的2.5到4倍。这意味着，关税的累积效应和非线性影响会导致经济损失不成比例地增加。
- 贸易萎缩更为严重：进出口的更大跌幅显示出贸易活动受到更明显的抑制，这会进一步削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

中美相互加征30%关税的影响

- 社会福利损失巨大：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社会福利的损失都在急剧增加。中国社会福利的下降绝对值依然大于美国，互征10%关税时，下降1628亿美元；互征30%关税时，下降4885亿美元，这说明更高的关税对中国消费者和整体社会福祉造成了更严重的打击。
- 贸易平衡的“改善”是表象：尽管两国的贸易顺差都显示出更大的增加，但这主要是因为高关税导致进口需求大幅萎缩，而非出口的强劲增长。这种“改善”是以牺牲经济总量和福利为代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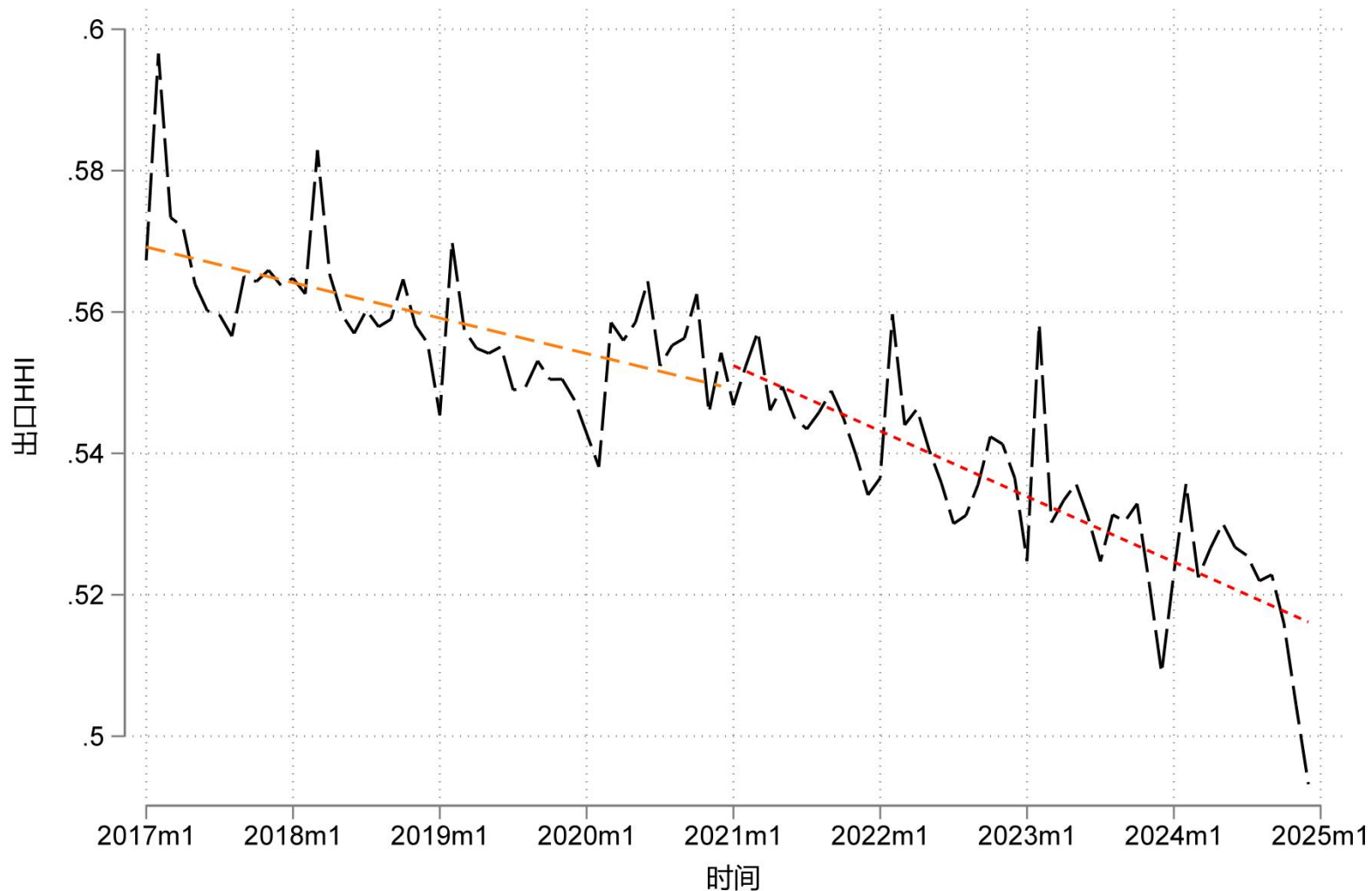
对中国各部门的影响

行业	出口	进口	贸易平衡
谷物和作物	0.34	-0.93	68.08
畜牧业和肉制品	0.67	-1.57	33.96
自然资源	0.18	0.03	-10.77
加工食品	-0.1	-0.75	26.55
纺织及制衣业	-1.92	-1.27	-512.23
轻工业	-1.24	-1.84	-83.10
重工业	0.15	-0.46	681.21
公共事业与最终消费	0.54	-0.37	10.48
运输与通讯	0.25	-0.27	77.86
其他服务业	0.47	-0.28	62.06

对美国各部门的影响

行业	出口	进口	贸易平衡
谷物和作物	-0.56	-0.26	-3.02
畜牧业和肉制品	-1.14	-0.3	-23.78
自然资源	0.05	-0.06	2.03
加工食品	-0.42	-0.24	-38.81
纺织及制衣业	-1.16	-2.63	30.53
轻工业	-1.58	-0.74	-18.06
重工业	-0.32	-0.35	10.96
公共事业与最终消费	0.36	-0.19	9.57
运输与通讯	0.21	-0.13	59.65
其他服务业	0.28	-0.15	13.49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 出口的HHI指数反映出口分散程度，指数越小，分散程度越大，意味着中国出口多元化程度越大。
- 2017年初至2020年末：HHI指数在0.53至0.59之间波动，整体相对稳定，未出现明显的持续上升或下降趋势，但波动性较大。
- 2020年末至2024年末：HHI指数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从2020年末的0.55左右，持续下降至2024年末的0.4932，达到该时期最低点，即中国出口的多元化程度显著提高。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 2017年初-2020年末：波动与初步适应期
- HHI指数特点：在这一时期，HHI指数在较高水平（0.53-0.59）波动，没有显著的趋势性变化。
- 前期（2017-2018年中）：全球化趋势仍在延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稳固，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相对稳定。HHI的波动反映了全球市场需求的季节性变化或短期贸易摩擦的初步影响。
- 中美贸易摩擦初期（2018年中-2019年）：随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受到直接冲击。然而，HHI指数的稳定可能表明中国企业在初期通过贸易转移（将出口转向非美国市场，如欧盟、东盟等）或产品结构调整（规避受关税影响的产品）来适应新环境，从而避免了出口集中度的急剧上升。部分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产品出口减少，反而使未受影响的产品出口份额相对集中。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 新冠疫情爆发初期（2020年）： 2020年全球疫情爆发，导致供应链中断和国际需求锐减。
- 在此背景下，HHI指数的波动可能反映了：
- 短期集中：在疫情初期，全球对特定产品（如医疗物资、居家办公相关产品）的需求激增，鉴于中国在这些领域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优势，其出口暂时集中于满足这些紧急需求市场，导致HHI上升。
- 冲击与适应：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和各国封锁，非必需品出口可能受阻，导致部分出口市场萎缩，保留下来的稳定出口渠道因此变得更加集中。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 2020年末至2024年末：持续显著的多元化发展期
- HHI指数特点：从2020年末开始，HHI指数呈现出明显、持续的下降趋势，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正在经历深刻且广泛的多元化。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 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走向：
- 韧性与风险规避： 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以及疫情暴露出的全球供应链脆弱性，促使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置于优先位置。出口市场的高度多元化是增强韧性的关键策略之一，意味着中国不再过度依赖少数几个大型出口市场，从而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 “去风险化”与主动求变： 面对西方国家提出的“去风险化”或“去中国化”趋势，中国积极采取措施，主动拓展新的贸易伙伴，避免被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之外。HHI指数的持续下降表明这些“向外走”的策略正在奏效。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 “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与这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紧密，有效分散了传统出口市场的风险。
- 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2年生效，降低了区域内贸易壁垒，促进了中国与东盟、日韩、澳新等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这为中国出口提供了更广阔、更便捷的市场，加速了出口多元化进程。

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

- 产业结构升级与产品创新：中国制造业的持续转型升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的增加，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发生变化。这些新兴产品可能面向更广泛的全球市场，或为中国开辟了新的出口增长点，从而促进了产品层面的出口多元化。
- 企业战略调整：在外部压力和政策引导下，中国企业积极调整出口策略，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当前中国与几乎所有联合国统计分类中的国家和地区都进行了贸易往来，参与进出口活动的企业数量也创下新高。

特朗普2.0关税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影响预测

- HHI指数的短期波动与长期加速多元化：
- **短期波动：**受贸易摩擦冲击，可能会在短期内对中国出口HHI指数造成一定的波动，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回升。这是因为新的摩擦会再次打乱现有贸易关系，迫使企业在应对不确定性时，暂时集中于少数当前可行的市场或产品。
- **长期趋势：**鉴于中国在过去几年已经在出口多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且这种多元化是主动战略调整的结果，新的摩擦更有可能加速而非逆转已有的多元化趋势。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方案

- 强化供应链自主可控：贸易摩擦将促使中国在关键领域进一步提升本土化生产能力，减少对外部（尤其是美国）的依赖，以保障出口供应链的稳定性。这包括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卡脖子”技术，并建立更完善的国内供应链体系。
- 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区域化：贸易摩擦将加速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外国买家和跨国公司可能会进一步寻求减少对中国作为单一出口来源的依赖，从而促使中国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并推动以RCEP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与区域内国家的产业链合作，形成更加紧密的“亚洲内循环”出口供应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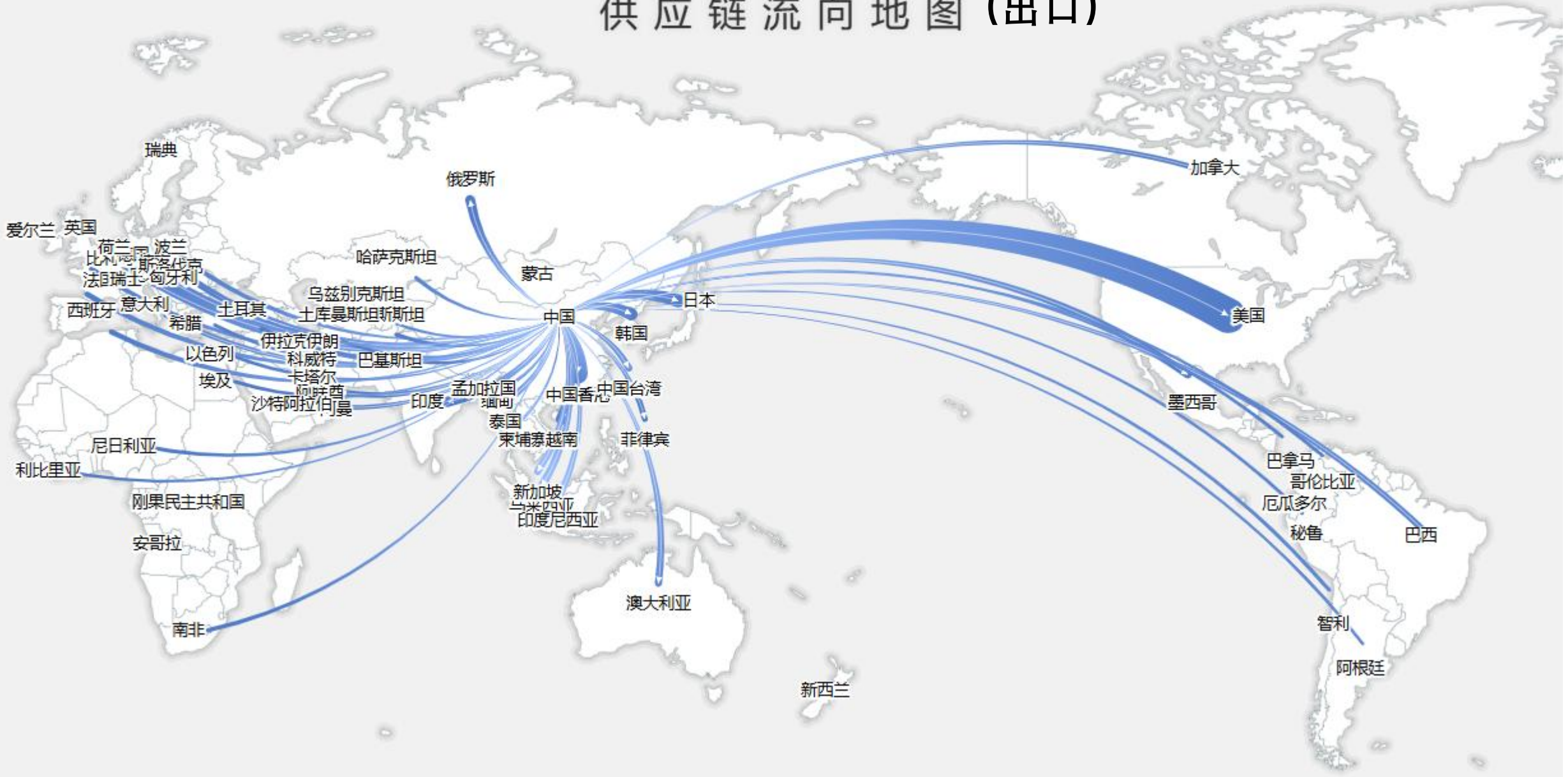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方案

- 深化出口市场多元化：中国将继续拓展其出口朋友圈，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成员国、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贸易关系。这将使得中国出口不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从而增强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向高附加值转移：贸易摩擦将倒逼中国企业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转型，减少对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赖。“新三样”的出口比重将继续上升，这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并为出口多元化提供产品支撑。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方案

- 概括而言，与2018年相比，当前中国已积累了应对经验且已走在贸易多元化的道路上。
- 对此，摩擦可能导致出口HHI指数的短期波动，但从长远来看，其将进一步加速中国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的多元化趋势，并推动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链供应链向更具韧性、更自主可控、更区域化和更高价值链的方向发展。

供应链流向地图 (出口)



供应链流向地图 (进口)



以高质量开放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 强化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力争实现互利共赢
- 以制度型开放引领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 强化“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
- 积极推动对外投资，重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强化中美经贸磋商机制

- 在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特朗普2.0关税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应秉持平等对话、互利合作的基本原则，积极寻求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如欧盟、日本等的经贸共识。
- 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前紧张的经贸关系，更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全球贸易稳定发展的关键。
- 具体而言，中国应进一步强化与各国的高层沟通机制，通过定期的高层互访、经贸对话及联合工作组会议等形式，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
- 在对话过程中，中国应明确表达自身立场与关切，同时倾听对方诉求，共同探索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 中国还应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与发展，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进程，维护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与有效性。
- 中国可以引导国际社会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维护全球贸易的自由与公平。

强化“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

- 中国应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等多维度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 在合作过程中，中国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道路选择，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积极推动对外投资，重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 面对特朗普2.0关税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与挑战，中国应积极推动对外投资工作力度，加快重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进程。
- 中国应继续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布局工作力度，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对外投资结构体系。

积极推动对外投资，重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 通过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力度，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等措施的实施，提高对外投资质量与效益水平；
- 同时加强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地区投资力度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等措施的实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积极推动对外投资，重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 通过加强与共建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与交流工作力度，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国际产能合作关系网络等措施的实施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配置与协同发展。
- 此外，加强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

谢谢！

报告人：王孝松

wangxiaosong@ruc.edu.cn



CMF

China Macroeconomy Forum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聚焦中美关税谈判之后的外贸走向，CMF专题报告发布

6月7日，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6期）于线上举行。

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刘凤良主持，聚焦“中美关税谈判之后的外贸走向”，来自学界、企业界的知名经济学家刘元春、刘凤良、许斌、屠新泉、徐高、王孝松联合解析。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主要成员王孝松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报告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 一、特朗普 2.0 关税政策与中方反制
- 二、中美联合声明发布后的贸易走向
- 三、未来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措施
- 四、以高质量开放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6月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习近平指出，两国经贸牵头人在日内瓦举行会谈，迈出了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经贸问题的重要一步，受到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也证明对话和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双方要用好已经建立的经贸磋商机制，秉持平等态度，尊重各自关切，争取双赢结果。对此，中方是有诚意的，同时也是有原则的。日内瓦会谈之后，中方严肃认真执行了协议。美方应实事求是看待取得的进展，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双方应增进外交、经贸、军队、执法等各领域交流，增进共识、减少误解、加强合作。

特朗普表示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中美关系十分重要。美方乐见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增长。美中合作可以做成很多好事。两国日内瓦经贸会谈很成功，达成了好的协议。美方愿同中方共同努力落实协议。美方欢迎中国留学生来美学习。

习近平欢迎特朗普再次访华，特朗普表示诚挚感谢。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团队继续落实好

日内瓦共识，尽快举行新一轮会谈。

一、特朗普 2.0 关税政策与中方反制

今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就职以来，频繁出台多项关税政策。2 月 4 日，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取消价值低于 800 美元的包裹关税豁免政策。此时，美国对华关税均值为 30.8%。与此同时，中国采取了反制措施，对美国能源进口加征 15% 关税，并对五种关键矿产实施出口管制。此时中国对美关税均值为 21.9%。2 月 10 日，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对钢铝产品征收 25% 的进口关税。3 月 4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芬太尼问题”为由，对中国输美商品的额外关税从 10% 上调至 20%，涉及电子、机械、化工等广泛领域。此时美国对华关税均值为 42.1%。中国对美国大豆、鸡肉、棉花等农产品加征关税，并对光学纤维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将 10 家美国企业例如不可靠实体清单，此时中国对美关税均值为 22.6%。3 月 26 日，美国宣布自 4 月 2 日起，在世界范围内对进口汽车整车征收 25% 关税，零部件关税最迟于 5 月 3 日生效。针对符合《美墨加协定》（USMCA）的汽车，仅对“非美国成分”部分征税。4 月 2 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宣布对所有进口商品加征 10% 的“基准关税”，并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 34% 的“对等关税”，叠加此前因芬太尼问题征收的 20% 关税，累计加征税率达 54%。4 月 4 日，中国宣布自 4 月 10 日起对所有美国进口商品加征 34% 关税。4 月 7 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中国未在 4 月 8 日前撤回报复性关税，美国将于 4 月 9 日对中国商品额外加征 50% 关税，累计加征税率将达 104%。4 月 9 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宣布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对美国加征 50% 关税。4 月 11 日，特朗普宣布对华关税从 104% 提高至 125%，叠加 20% 的芬太尼关税，累计加征税率达 145%，并称“若各国 90 天内未达成协议，将恢复更高关税”。自北京时间 4 月 12 日起，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加征 125% 关税。4 月 15 日，美国白宫发布针对“232 条款”的声明，宣称“中国部分商品将面临最高 245% 的关税”。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美方对华轮番加征畸高关税已经沦为数字游戏，在经济上已无实际意义，如果美方继续关税数字游戏，中方将不予理会。

5 月 12 日，中美发布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宣布将 4 月 2 日以来对双方加征的 125% 关税降至 34%，并参照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做法，对其中 24% 的关税暂停 90 天实施，仅加征剩余 10% 的关税。在对等关税 90 天豁免期内，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税率从 145% 降至 30%，即包括 20% 芬太尼相关关税+10% “对等关税”，而中国对美国加征的关税税率从 125% 降至 10%。

一方面，联合声明在短期具有积极意义，虽然关税没有全部取消，但大幅降低了双边关税水平，这就可以把之前暂停的中美贸易先恢复起来，在此基础上，中美双方才有基础就更多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迈出了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的重要一步，也为进一步弥合分歧和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在协议达成前，中国对美出口的部分产品关税已处于极高水平。在特朗普 2.0 时期的关税政策下，注射器和针头产品的关税高达 245%，锂离子蓄电池为 173%，枪乌贼为 170%，羊毛衫与纺织服装为 169%等。按照传统标准，超过 145%的关税基本可视为“禁止性关税”，将对中美经贸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在特朗普 2.0 关税政策实施后，中国对美出口明显下降。与此同时，美国对华出口也出现下降，因为中国同步采取了反制措施。若无联合声明，中美双边贸易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抑制影响。从出口侧看，4 月，由于超 6 成输美产品受到高额“对等关税”影响，我国对美国出口 330.2 亿美元，同比下降 21.0%，拉低总出口增速约 3 个百分点。从进口侧看，自美国进口 125.7 亿美元，同比下降 13.7%，拉低总进口增速约 0.9 个百分点。

高频数据显示，中美发布经贸联合声明之后，全球贸易和美国进口环比大幅改善，5 月全月仍同比小幅下降。集装箱追踪数据软件商 Vizion 的周度数据显示，5 月全球集装箱预定量环比增长 5.8%，同比下降 2.3%（4 月同比下降 7.3%）；美国集装箱预定量环比增 26.6%，同比降 2.3%（4 月同比降 12.8%）。中国对美出口高频数据大幅改善，出现“抢出口”状况，5 月全月我国总出口同比预计增长 5%左右。Vizion 和物流平台 Freight Waves 数据显示，中美和谈后的两周，中国至美国航线的集装箱预定量较 5 月初低点大幅提升，超过了“对等关税”宣布前的水平，出现“抢出口”状况；5 月全月中国至美国航线的集装箱预定量环比增长 54.2%，同比降幅收窄至 12.5%。此外，“抢转口”强度仍然较高，海运平台数据显示，5 月越南港口到港、离港船舶数量同比分别增长 23.0%、20.2%，连续创历史同期新高。根据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5 月以来，我国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 5%，环比增 0.8%。根据海运平台公布的日度船舶到港、在港、离港数据，5 月我国离港船舶载重吨同比增 1.5%，环比增 2.8%。从整体来看，5 月的高频数据显示出我国出口具有较强的韧性。

另一方面，联合声明在中长期也具有积极意义。声明最后明确指出，中美双方将建立机制，继续就经贸关系进行协商。核心含义是：中美双方将通过制度化的沟通机制，持续就经贸问题进行对话，以解决分歧。未来可以推动中美关系朝着更加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为

中美关系长期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和贸易重要参与者，经贸关系缓和有助于稳定全球贸易秩序，为全球贸易健康发展注入稳定剂，向国际社会传递了积极信号，展示了对自由贸易的支持，有助于增强各国对自由贸易的信心，推动全球经济朝着更加开放、自由的方向发展，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新动力和方向。

正如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彻底纠正单边加税的错误做法，不断加强互利合作，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共同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

二、中美联合声明发布后的贸易走向

我们采用标准静态 GTAP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模型进行模拟，GTAP 是一个多地区、多部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我们使用 GTAP 第 10 版数据，设定多种场景，模拟出中美达成经贸协议对经济总量、贸易额、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

在中美相互加征 10% 关税的乐观场景下，经济总量和收入方面，两国都呈现负增长，中美分别下降 0.04 和 0.01 个百分点，中国受到的负面影响略大于美国。进出口贸易均受到抑制，两国都出现下降，但贸易平衡却表现为正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进口下降幅度相对更大。两国贸易条件都有所恶化，而社会福利是两国受影响最大的领域，中国社会福利下降 1628.29 亿美元，美国下降 793.76 亿美元。

从对中国各个部门的影响来看，农业部门和部分资源部门在出口增长或进口下降的带动下，贸易平衡普遍有所改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受到关税的直接冲击最为严重，出口大幅下滑，导致贸易平衡显著恶化。部分高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如电子、机械、汽车）虽然出口受到一定影响，但由于进口下降幅度更大，其贸易平衡反而有所改善。服务业总体表现出较强的韧性，多数部门的贸易平衡有所改善，这与服务贸易的特殊性以及关税对其直接影响相对较小有关。从整体来看，关税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了影响，促使相关产业调整，但对关键的出口支柱型产业带来了巨大压力。

从对美国各个部门的影响来看，出口普遍下降，但进口变化更为复杂，有升有降。总体

而言，多数部门的贸易平衡有所改善，主要是由于进口下降的幅度大于出口下降，或者进口本身转为负增长，这与国内需求转向或进口替代有关。与此同时，部分关键制造业部门的贸易逆差扩大。

互征 10%关税对中美两国的影响对比可以总结为以下七点。第一，在 GDP 方面，中国下降 0.04%，美国下降 0.01%，两国经济增长均受到一定影响。

第二，在农产品及食品加工工业方面，中国出口普遍增加，进口普遍下降，贸易平衡普遍改善，例如稻米、小麦、油料种子贸易平衡显著改善，美国出口普遍下降，进口有增有减，贸易平衡多为改善，例如稻米、小麦贸易平衡改善，但油料种子、猪/家禽贸易平衡恶化。中国农产品受益于关税，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平衡普遍改善；而美国农产品出口受损，贸易平衡改善是由于进口下降的相对作用。两国农产品在对方市场的竞争地位不同，关税改变了各自农产品市场结构。

第三，在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中国出口大幅下降，贸易平衡显著恶化，例如服装制造贸易平衡下降 15.89 亿美元，美国出口大幅下降，进口更大幅度下降，贸易平衡显著改善，例如服装制造贸易平衡增加 75.7 亿美元。中国作为这些产业的主要出口国，直接受到关税冲击，贸易平衡恶化严重。美国作为进口国，关税使其进口大幅萎缩，从而改善了贸易平衡，但消费者会支付更高价格。

第四，在高科技/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如电子、机械、汽车)方面，中国有增有减，部分贸易平衡改善，例如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贸易平衡大幅增加 73.91 亿美元，美国多数出口下降，贸易平衡有增有减，部分重要部门恶化，例如汽车制造贸易平衡下降 11.37 亿美元。美国汽车制造业贸易平衡恶化较为突出，反映其供应链的全球化程度及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中国部分高科技部门贸易平衡改善，可能受益于进口替代。

第五，在服务业方面，中国服务业普遍呈现贸易平衡改善，美国出口普遍下降，进口普遍增长，但多数贸易平衡改善。两国服务业在贸易平衡上都呈现改善趋势。

第六，在矿业方面，中国贸易平衡普遍恶化，美国贸易平衡普遍改善。中国矿业贸易平衡恶化，可能因其对能源和矿产的进口依赖。美国矿业贸易平衡改善，可能反映其能源独立性或国内产能提升。

从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走向来看，关税减免直接降低了贸易成本，企业利润空间得以修复，例如苹果公司的 iPhone 生产线对华依赖度超过 70%，关税调整可使每台设备成本降低 5%–8%，全球零售价有望同步下调。中国暂停非关税反制措施（如技术认证壁垒），将推动中美技术标准互认，加速 5G 和人工智能产业链的整合。

联合声明提出建立“季度技术磋商+半年部长级会谈”机制，这一制度性安排显著增强了政策确定性，使世界经济稳定性增强，跨国企业中长期投资决策的确定性提升。特斯拉已宣布追加 50 亿美元在华电池工厂投资，而台积电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 3 纳米芯片生产线，意味着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加速。

协议中“第三国会谈机制”的设立（如选择新加坡或瑞士作为磋商地），为中美在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敏感领域的技术标准对话预留了空间，将会降低全球科技产业链分裂风险。东南亚国家作为中美贸易“中间节点”，将受益于关税降低带来的区域物流成本下降。例如，越南电子组装企业的中国零部件进口成本预计下降 15%，马来西亚棕榈油、泰国橡胶等对华出口渠道更趋稳定。日韩等深度融入中美产业链的经济体，其汽车、半导体产业的跨境协作风险显著降低。

三、未来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及应对措施

从中长期来看，中美贸易仍面临显著的不确定性。因为美国从战略上遏制中国的目标未改变，中美两国仍存在结构性矛盾——美国坚持“零和思维”，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尽管协议取得突破，但剩余 10% 的惩罚性关税仍影响约 2000 亿美元商品流动，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生物技术等战略领域。

5 月 13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了一份指南，以所谓违反美出口管制为由，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禁用中国先进计算芯片，包括特定的华为昇腾芯片。此外，美国国会可能通过立法手段干扰协议执行，例如推动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这一风险将使全球企业面临额外的合规成本。地缘政治风险仍然突出，美国近期通过《巴拿马运河安全法案》，试图遏制中国在拉美的物流影响力，中美在关键战略支点的争夺可能外溢至经贸领域。

在 GTAP 模型框架下，我们模拟了未来不确定性增加，中美互征 30% 关税的影响。总体来看，负面影响显著加剧，GDP、出口、进口、贸易条件、收入和社会福利等各项负面指标的下

降幅度在 30%关税情景下均有所扩大，基本是 10%关税影响的 2.5 到 4 倍，例如美国的 GDP 会有 0.04 个百分点的下降，而中国会有 0.12 个百分点的下降。这意味着，关税的累积效应和非线性影响会导致经济损失不成比例地增加。贸易萎缩更为严重，进出口的更大跌幅显示出贸易活动受到更明显的抑制，这会进一步削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效率。其中，进口降幅更为明显，导致贸易余额反而出现增长。美国贸易顺差将增加 2708.8 亿美元，中国将增加 2522.56 亿美元。但由于贸易条件与收入水平均有所下降，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社会福利的损失都在急剧增加。中国社会福利的下降绝对值依然大于美国，互征 10%关税时，下降 1628 亿美元；互征 30%关税时，下降 4885 亿美元（美国为 2381.29 亿元），这说明更高的关税对中国消费者和整体社会福祉造成了更严重的打击。

贸易平衡的“改善”是表象，尽管两国的贸易顺差都显示出更大的增加，但这主要是因为高关税导致进口需求大幅萎缩，而非出口的强劲增长，这种“改善”是以牺牲经济总量和福利为代价的。

从对中国各个部门的影响来看，与 10%关税的情形相似，仅影响幅度更大。按照 10 部门划分，中国大多数行业出口仍为增加，仅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行业出口下降较为明显，大多数行业进口下降，贸易余额相应改善。

美国各个部门的影响也和 10%关税的情形类似，所有的行业进口都出现了下降，大部分行业出口减少，贸易余额变化不一，部分行业因进口降幅更大，贸易余额有所增加。

接下来，我们选用 HHI（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发展进行分析。出口的 HHI 指数反映出口分散程度，指数越小，分散程度越大，意味着中国出口多元化程度越大。2017 年初至 2020 年末，HHI 指数在 0.53 至 0.59 之间波动，整体相对稳定，未出现明显的持续上升或下降趋势，但波动性较大。具体来看，2017-2018 年中，全球化趋势仍在延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稳固，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相对稳定。HHI 的波动反映了全球市场需求的季节性变化或短期贸易摩擦的初步影响。2018 年中-2019 年中美贸易摩擦初期，随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出口受到直接冲击。然而，HHI 指数的稳定可能表明中国企业在初期通过贸易转移（将出口转向非美国市场，如欧盟、东盟等）或产品结构调整（规避受关税影响的产品）来适应新环境，从而避免了出口集中度的急剧上升。部分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产品出口减少，反而使未受影响的产品出口份额相对集中。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全球疫情爆发，导致供应链中断和国际需求锐减。在此背景下，HHI 指数

的波动主要反映两个特点：一是短期集中，在疫情初期，全球对特定产品（如医疗物资、居家办公相关产品）的需求激增，鉴于中国在这些领域具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优势，其出口暂时集中于满足这些紧急需求市场，导致 HHI 上升；二是冲击与适应，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和各国封锁，非必需品出口可能受阻，导致部分出口市场萎缩，保留下来的稳定出口渠道因此变得更加集中。

2020 年末至 2024 年末，HHI 指数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从 2020 年末的 0.55 左右，持续下降至 2024 年末的 0.4932，达到该时期最低点，即中国出口的多元化程度显著提高，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正在经历深刻且广泛的多元化。

未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走向需要关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韧性与风险规避。**中美贸易摩擦的长期化以及疫情暴露出的全球供应链脆弱性，促使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置于优先位置。出口市场的高度多元化是增强韧性的关键策略之一，意味着中国不再过度依赖少数几个大型出口市场，从而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第二，“去风险化”与主动求变。面对西方国家提出的“去风险化”或“去中国化”趋势，中国积极采取措施，主动拓展新的贸易伙伴，避免被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之外。HHI 指数的持续下降表明这些“向外走”的策略正在奏效。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来源，与这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紧密，有效分散了传统出口市场的风险。

第四，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2 年生效，降低了区域内贸易壁垒，促进了中国与东盟、日韩、澳新等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增长。这为中国出口提供了更广阔、更便捷的市场，加速了出口多元化进程。

第五，产业结构升级与产品创新。中国制造业的持续转型升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如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的增加，使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发生变化。这些新兴产品可能面向更广泛的全球市场，或为中国开辟了新的出口增长点，从而促进了产品层面的出口多元化。

第六，企业战略调整。在外部压力和政策引导下，中国企业积极调整出口策略，加大对新兴市场的开拓力度，优化全球市场布局。当前中国与几乎所有联合国统计分类中的国家和

地区都进行了贸易往来，参与进出口活动的企业数量也创下新高。

受特朗普 2.0 关税的影响，中国出口 HHI 指数短期可能会出现波动，甚至可能出现短暂的回升。这是因为新的摩擦会再次打乱现有贸易关系，迫使企业在应对不确定性时，暂时集中于少数当前可行的市场或产品。但鉴于中国在过去几年已经在出口多元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且这种多元化是主动战略调整的结果，新的摩擦更有可能加速而非逆转已有的多元化趋势。

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方面，有以下四点政策建议。一是**强化供应链自主可控**。贸易摩擦将促使中国在关键领域进一步提升本土化生产能力，减少对外部（尤其是美国）的依赖，以保障出口供应链的稳定性。这包括加大研发投入，突破“卡脖子”技术，并建立更完善的国内供应链体系。

二是**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与区域化**。贸易摩擦将加速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外国买家和跨国公司可能会进一步寻求减少对中国作为单一出口来源的依赖，从而促使中国企业更加积极地参与并推动以 RCEP 为代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与区域内国家的产业链合作，形成更加紧密的“亚洲内循环”出口供应链。

三是**深化出口市场多元化**。中国将继续拓展其出口朋友圈，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 成员国、非洲和拉美等地区的贸易关系。这将使得中国出口不再过度依赖单一市场，从而增强其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四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向高附加值转移**。贸易摩擦将倒逼中国企业加速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转型，减少对受关税影响较大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依赖。“新三样”的出口比重将继续上升，这有助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并为出口多元化提供产品支撑。

与 2018 年相比，当前中国已积累了应对经验且已走在贸易多元化的道路上。对此，摩擦可能导致出口 HHI 指数的短期波动，但从长远来看，其将进一步加速中国出口市场和产品结构多元化趋势，并推动中国出口导向型产业链供应链向更具韧性、更自主可控、更区域化和更高价值链的方向发展。

在出口方面，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来看，中国是几乎所有贸易伙伴的关键出口对象，而从

出口流向来看，美国依旧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在进口方面，中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凭借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对中间品的进口需求日益增长，已成为多数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四、以高质量开放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第一，强化中美经贸磋商机制。在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特朗普 2.0 关税冲击的背景下，中国应秉持平等对话、互利合作的基本原则，积极寻求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如欧盟、日本等的经贸共识。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当前紧张的经贸关系，更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全球贸易稳定发展的关键。具体而言，中国应进一步强化与各国的高层沟通机制，通过定期的高层互访、经贸对话及联合工作组会议等形式，增进相互理解与信任。在对话过程中，中国应明确表达自身立场与关切，同时倾听对方诉求，共同探索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第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中国应积极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与发展，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进程，维护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与有效性。中国可以引导国际社会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维护全球贸易的自由与公平。

第三，强化“一带一路”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应继续深化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经贸合作，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及民心相通等多维度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在合作过程中，中国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道路选择，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

第四，积极推动对外投资，重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面对特朗普 2.0 关税冲击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影响与挑战，中国应积极推动对外投资工作力度，加快重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进程。中国应继续优化对外投资结构布局工作力度，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对外投资结构体系。通过加强对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力度，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等措施的实施，提高对外投资质量与效益水平。同时加强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地区投资力度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等措施的实施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加强与共建国家和地区的产能合作与交流工作力度，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的国际产能合作关系网络等措施的实施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优化配置与协同发展。此外，加强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持力度，推动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

论坛第二单元，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中美关税谈判之后的外贸走向”展开讨论。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讲席教授许斌指出，在以往的全球化时代，贸易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然而，进入“特朗普时代”后，贸易逻辑发生了显著变化。这里的“特朗普时代”是指一种新的贸易政策导向，即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而是更加注重地缘政治收益。某些行业或产品对国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缺乏这些产品可能导致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国家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传统贸易收益，以换取地缘政治上的优势。这种权衡反映了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率向兼顾国家安全和战略自主性的转变。

从短期来看，美国的经济损失是相当显著的。尽管美国的损失没有中国大，但其损失程度也足以成为特朗普对中国及其他国家采取强硬态度的所谓“经济支撑”。如果特朗普坚持其政策是为了更中长期的利益，并且美国整体政治气候仍允许他继续推进，那么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特朗普仍可能继续推进“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再工业化相关举措。在短期内，中国可能会因失去美国市场以及其他相关市场而面临较大的经济负面影响，其经济损失在短期内可能大于美国。然而，从短期经济损失与长期地缘政治收益的权衡来看，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美国发动的全面关税战使得夹在中美之间的经济体在地缘政治上更倾向于远离美国，这种隐性博弈不利于美国，而有利于中国。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中美谈判进程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目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6%，引发了市场对美国国债可持续性的广泛担忧，未来谈判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国债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动态调整。第二，特朗普的基本盘主要包括中下阶层，未来美国市场的通胀预期、百货市场定价机制的变化，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对于生活成本支出的不满情绪，都会对贸易与关税谈判的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第三，稀土出口管制将直接影响全球汽车产业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进程，可能导致相关环节出现停滞，对美国整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从而影响谈判进程。此外，我们还需关注美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分化。

基于以上分析，中方在未来谈判过程中不宜操之过急，这一点至关重要。其次，应持续贯彻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进一步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健康运行基础，在关键风险防控方面加快政策落地，同时对关税冲突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展点

对点式精准应对。这样，我们才能在基本谈判节奏上取得战略先机。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充分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突出优势，完全具备在关税冲突中取得胜利的能力。当然，要充分认识到未来可能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例如从传统贸易领域逐步向金融、服务等领域扩展，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延伸至更多板块的冲突与合作。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指出，美国在过去四十余年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内需过剩。美国在二战结束后至 1971 年 8 月 15 日期间，全球货币体系遵循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国承诺 1 盎司黄金兑换 35 美元，并维持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然而，1971 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意味着美国不再受黄金约束，可以大量发行美元。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工具，全球对美元存在较大需求。美元发行量的增加使得美国国内经济主体手中多出了可用于购买别国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符号，从而推动了美国国内需求的上升和美国贸易赤字的上升，并使其在近年来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若对今年的中国经济和市场进行展望，可概括为：在中美博弈中，中国不能输，中国市场不能退缩。美国发起对等关税，其自身也在付出代价。在此博弈中，任何一方退缩都可能助长对方的势力，为对方提供可施加的压力。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压力，中国必须保持经济稳定，而事实上中国拥有较大的政策空间来维护经济增长的稳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今年实现 5% 的增长目标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进一步加大财政宽松力度，包括对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支持，以提振投资、保障经济平稳运行，中国便能在中美博弈中站稳脚跟，并在维护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赢得中美贸易摩擦。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反映了两个基本事实。首先，中美双方均无意愿或未准备好与对方彻底脱钩，尤其是美国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特朗普在 4 月 2 日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并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这是美国的长期既定方针且不会改变，但从最终结果及政策变化来看，他实际上随时都在调整立场，这表明他并未真正准备好与中国彻底脱钩。第二，关于彻底脱钩或短期内硬脱钩对美国的冲击，至少从短期来看，其影响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和特朗普的承受能力均低于我们的预期，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国债市场出现了超出预期的动荡，这种动荡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施政以及下一阶段财政赤字的扩大。

在当前形势下，从中长期来看，中美贸易发展的趋势是进一步脱钩，脱钩的范围和程度

必将持续扩大，但中美之间不会彻底脱钩。未来的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可能呈现双核驱动的格局，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很可能从过去较为紧密的直接联系，转向一种更扩散化的间接联系，这种趋势已经显现。中国需要调整参与全球经济和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模式，从过去偏重贸易，转变为贸易与投资并重。从制度层面来看，当前的重点不再是推动关税下降或贸易自由化，而是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突破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剩余的高关税产品大多是各国最为敏感的领域，其规模也相对较小。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各国国内规制的协调，是更为重要且需要优先展开的工作。

牢牢认清决定关税谈判的三大关键因素

刘元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
联合创始人

以下观点整理自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
（第106期）上的发言

一、在更全面的框架中破解关税谈判的不确定性

“中美关税谈判后的外贸走向”是一个广受关注但又极为复杂的议题。其复杂性在于美国将关税作为谈判的砝码。这导致理解其关税政策已超越了传统的政策分析框架和博弈论框架。因此，未来具体的谈判走向依然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自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以来，他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关税本身。相比之下，由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对于市场主体决策的冲击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税仅是特朗普2.0执政阶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其政策推进的起点。未来围绕汇率、公共安全、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政府改革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可能会更具冲击力。

要深入理解这一问题，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思考：一是理清美国将关税作为筹码进行相关谈判的基本模式；二是深入把握“MAGA主义”在未来几年的执政逻辑、政策出台顺序及其背后的基本原则；三是要理解与美国展开博弈的不同层级主体的反应机制，以及全球经济体系正在发生的结构性、革命性变化的本质。若无法从上述三个维度形成清晰认识，将难以对未来发展进行有效判断，目前市场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在特朗普政策节奏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剧。

二、三大关键因素直接决定了美国关税谈判

过去五个月，特朗普政府多次将关税作为筹码进行要挟和打压，对全球市场产生了一系列冲击，超出了传统认知范畴，但其中仍有三个可以把握的关键因素。

第一，关税冲击对全球形势的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震荡远超预期。自4月2日（即“解放日”）以来，尽管从绝对数值上看，全球

金融市场已开始有所填补前期的跌幅，但每一项关税举措都伴随着剧烈的市场波动。这一波动尤为显著地体现在美国国债收益率及外围国家相应主体国债收益率的变化上。其本质在于：关税问题引发全球对贸易失衡问题、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格局以及全球外贸格局的重新评估，大家普遍意识到美国未来可能对全球资本，尤其是全球储备资产的管理方式，采取新的举措，由此导致全球资本流动模式和金融定价逻辑发生根本性转变。目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 4.6%，已超过美国名义 GDP 的增长速度，引发了市场对美国国债可持续性的广泛担忧。

与此同时，围绕“大而美”法案，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也日益激烈，特朗普与马斯克、民主党与共和党、共和党内部右翼与左翼之间的冲突全面爆发。这一冲突凸显了美国在谈判中所面临的关键短板，可能会从根本上动摇全球对美国地位的认知，从而影响全球资本的流向，最终反噬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与其全球霸权模式的根基。因此，4月9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未采取报复行动的国家”暂停实施“对等关税”90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出于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以及国债市场波动的顾虑。**由此可见，未来谈判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国债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动态调整。**

第二，特朗普的基本盘主要包括中下阶层，当前关税措施对美国通胀水平和中下阶层生活成本的影响，仍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关键议题之一。从美国开始关税战以来，其产业链，特别是供应链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4月2日特朗普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后的一个月内，即5月初，供应链效应开始显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百货商场出现部分中国商品断供现象；二是美国日常生活用品出现价格调整，例如沃尔玛宣布涨价。

正因如此，5月8日中美双方重启谈判，美国方面强烈要求立即进行磋商。这表明，特朗普在关税政策博弈中认为关税不会推高美国物价水平的判断并不成立。同时，特朗普政府仍高度关注其中下阶层的支持基础。**因此，未来美国市场的通胀预期、百货市场定价机制的变化，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对于生活成本支出的不满情绪，都会对贸易与关税谈判的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

第三，特朗普方面迫切希望与习近平总书记通话，强烈要求中美尽快重启关税谈判，并向中方释放积极信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稀土问题，稀土出口管制将直接影响全球**

汽车产业关键零部件的生产进程，可能导致相关环节出现停滞，对美国整体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从过去五个月的情况来看，美国国债价格、通胀水平以及关键要素供应状况是决定美方谈判进程与基本态度的三个关键因素。

此外，我们还需关注美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分化，这极有可能成为影响谈判走向的第四股力量，其作用是综合性的，甚至超越上述三个关键因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美国政府内部和执政党内部的分歧与对立，以及不同社会阶层在重大政策问题上的认知差异。

三、需要跳出关税进行政策设计

基于以上分析，中方在未来谈判过程中不宜操之过急，这一点至关重要。其次，应持续贯彻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进一步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健康运行基础，在关键风险防控方面加快政策落地，并对关税冲突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展点对点式精准应对。这样，我们才能在基本谈判节奏上取得战略先机。因此，下一阶段应将工作重心放在前瞻性事务的筹划与落实上，而非简单在外贸数量增减的预测问题上过度用力，当前形势具有高度不确定性，无法依赖传统预测模型进行准确判断。

同时，我们必须坚定信心，充分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尤其是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的突出优势，完全具备在关税冲突中取得胜利的能力。当然，要充分认识到未来可能发生的趋势性变化，例如从传统贸易领域逐步向金融、服务等领域扩展，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延伸至更多板块的冲突与合作，这些变化对于我们准确判断下半年外贸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两个时代”的全球贸易逻辑

许斌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讲习教授

以下观点整理自许斌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6期）上的发言

一、为了方便描述，本文将以前称为全球化时代，而将现在称为“特朗普时代”

1、全球化时代的全球贸易逻辑是基于纯经济考量。传统贸易理论指出，获取某种商品有两种途径：一是自行生产，二是通过生产其他商品与他国进行交换。贸易能够带来利益，因为通过贸易，人们可以用更低的成本获取某种商品，这便是基于比较优势的传统贸易理论。

贸易收益的第二个来源被新贸易理论所揭示。该理论基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形态，尤其是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一国可以专注于生产某一类型的产品，以换取同一产业的其他类型产品，从而获得贸易收益。其基础在于成本：大规模生产能够降低单位成本。

2、无论是传统贸易理论还是新贸易理论，都存在对偏离自由贸易政策的论述。在比较优势方面，动态比较优势是一个重要议题。如果仅依据静态比较优势，非洲国家可能只能专注于矿产资源开发，这将对其长期发展产生阻碍。制造业具有诸多额外好处，例如通过制造业的发展，国家能够不断实现产业升级，并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学习收益。相比之下，矿产品生产往往只是重复性劳动，难以带来类似的发展潜力。基于动态比较优势，存在不少理论支持在特定条件下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例如通过关税手段保护幼稚产业等。

3、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形成了支持政府干预的战略贸易政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表明，某些产业（如大型客机制造）由一个国家进行生产是具有经济效率的，其他国家则通过购买这个产品来满足需求。然而，这种生产集中化的国际布局本身也蕴含着重要的经济意义，涉及规模经济所产生的贸易收益由哪个国家获得的问题。

4、在以往的全球化时代，贸易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然而，进入“特朗普时代”后，贸易逻辑发生了显著变化。这里的“特朗普时代”并非特指特朗普任期，而是指一种新的贸易政策导向，即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收益的最大化，而是更加注重地缘政治收益。某些行业或产品对国家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缺乏这些产品可能导致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受制于人。因此，即使面临高昂的经济成本，国家也倾向于增加自身生产，以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若构建“特朗普时代”的贸易模型，其核心将是经济成本与地缘政治收益之间的权衡。具体而言，国家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受放弃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贸易收益的经济成本，以换取地缘政治上的收益。这种权衡反映了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率向兼顾国家安全和战略自主性的转变。

这一问题也涉及短期与长期的权衡。例如，特朗普主张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他认为制造业是国家的根本。从全球化自由贸易的逻辑来看，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会因失去对制造业的控制而出现产业空心化，进而损害其长期利益，这一观点在理论上也存在支持。因此，对于美国重建制造业的评估，除了看其短期是否划算，还需要考虑从长期来看回归制造业的经济代价是否大到无法抵消所获得的安全和地缘政治方面的收益。

二、对当前中美以及中美之外的经济三角关系的思考框架

1、从美国角度出发

从短期来看，特朗普的全面关税战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像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经济损失那么大，这成为特朗普对中国及其他国家采取强硬态度的所谓“经济支撑”。

若从地缘政治收益与经济成本的权衡角度审视特朗普发动全面关税战的决策，至少在短期内，其地缘政治收益并不存在，甚至可能带来负收益。这种短期权衡表明，美国的全面关税举措存在不可持续性。一旦出现某些因素，例如美国通胀率上升，导致政治上出现对特朗普关税战的巨大反弹，进而促使美国政治格局发生有利于民主党、不利于共和党的变化，那么特朗普匆忙结束或大幅退出全面关税战是可以预见的。然而，如果特朗普坚持其政策是为了更长期的利益，并且美国整体政治气候仍允许他继续推进，那么从地缘政治角度，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再工业化角度，特朗普仍可能继续推进相关举措。这是一个涉及长期与短期、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推导。

2、从中国角度出发

在短期内，中国可能会因失去美国市场以及其他相关市场而面临较大的负面经济影响，其经济损失在短期内可能大于美国。**然而，从短期经济损失与地缘政治收益的权衡来看，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美国发动的全面关税战使得夹在中美之间的经济体在地缘政治上更倾向于远离美国。这些“非中美”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会遭受重大损失，但并未获得相应的地缘政治收益。相反，特朗普以美国为中心的战略导致欧洲在军事上失去了一定的安全感，使其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均遭受损失。因此，无论是东盟还是欧盟，这些夹在中美之间的经济体在心理上都希望恢复到较低的关税水平。尽管它们不愿直接得罪美国，不会像中国那样明确反对，但它们仍会在幕后采取行动。这种隐性博弈不利于美国，而有利于中国。

从短期与长期的权衡来看，中国在短期内的经济损失相对较大。在过去较长时间内，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一直是重要的增长动力，而对美出口更是其中的关键部分。即便在首次贸易战之后中国对美出口面临困难，但通过对外投资以及中国企业“出海”，中国仍然间接地实现了大量商品对美国市场的出口。美国市场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需求端，很难被完全替代。

传统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概念，意味着优势与劣势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在和平稳定的时期，中国可以从美国进口粮食和芯片等产品，而美国则从中国进口各类制造业产品，双方相安无事。然而，在“特朗普时代”，地缘政治和长期安全的考量被赋予了重要权重，这必然导致美国对芯片、人工智能源代码等关键产品实施管制，并对中国实体经济采取所谓的制约措施。中国当然也会进行反制。这里的关键在于，这种制约会导致经济体本身产生内生性反应。**在中国方面，美国对华制约措施将推动中国经济从外需向内需转型，以及从技术模仿向技术自主创新转型。**美国则受制于中国的稀土供应，因为中国精炼了90%以上的稀土，开采了60%的稀土，其他国家如缅甸开采的稀土也在中国精炼。若美国坚持对向中国出口高端芯片实施严格管制，而中国坚持对向美国出口稀土实施严格管制，其长期经济效应将促使中国发展高端芯片产业，而美国则会更加注重从中国以外获取稀土。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格局会得到确立，中美之间的脱钩程度将进一步加深。

在对经济成本和地缘政治的双重考量下，中国一方面希望与美国达成相互减少制约的共识；另一方面，中国相较于美国更具耐力。美国实施全面关税政策可能引发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变化，使其难以承受；而中国经济虽会承受巨大的短期负面影响，但其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仍蕴含着较大的长期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尽管当前消费和投资驱动面临困难，中国仍可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冲贸易战的压力，因此中国具备更强的承受力，而美国则不然。

然而，美国鉴于中国的崛起，在长期战略上仍可能坚持推动与中国在重要环节上的脱钩。从长期来看，中美脱钩的趋势似乎难以避免，但完全脱钩又是不现实的。

三、总结

当前全球贸易格局中注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新变量，即地缘政治因素，特别是对国家安全的考量。对于大国而言，国家规模越大，这一考量就越重要。对于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这是极为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对于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也会作为部分考量因素。基于此，笔者曾提出一个假说，即全球经济“二区化”。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于那些处于中美之间的国家和地区，与中美任何一方的经济割裂几乎是不可承受的。然而，中美在诸多领域推动自主独立，对对方实施制约，是必然趋势。因此，全球经济会形成围绕中国和围绕美国的两个大区，由此形成的“二区化”是一种开放型的“二区化”，即中国政府主张的“开放的区域主义”。欧盟、东盟、拉丁美洲等地区既希望在与中美的经贸关系上获益，又不想在地缘政治上得罪中美中的任何一方。尽管“二区化”格局避免了全球经济走向“脱钩断链”，但它绝非是对全球化时代的回归。过去那种单纯基于经济考量的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新的时代。

中美贸易关系的演变与未来趋势——基于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分析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 研究院院长

以下观点整理自屠新泉在 CMF 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6期）上的发言

一、特朗普贸易政策的误判与调整

去年 11 月，笔者曾参与一次关于特朗普贸易政策的讨论，并对其进行了预判。然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的预判存在诸多误判，尤其是自身对形势的判断存在较大误差。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高估了特朗普的理性。在其第一任期内，我们已经为此吃过亏，但到了第二任期，仍未充分估计其非理性。今年上台后，特朗普在诸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些行为不仅局限于贸易领域，还涉及其他诸多方面，均超出了正常人的思维范畴。因此，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尤其是 4 月 2 日所谓的对等关税政策来看，其行为实属任性妄为，完全无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理性逻辑，是一种极为疯狂且超出理性范畴的做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特朗普又表现出一定的理性或务实性。在遭受现实挫折后，他能够迅速调整策略，其自称“身段灵活”也反映了这一特点。正如前文所述，4 月 2 日公布对等关税政策后，相关措施已经多次调整。其中，对中国而言，最大的调整源于中美日内瓦会谈取得的成果。此次会谈成果出人意料地迅速且显著，其规模之大超出了大多数外部观察人士和学者的预期。

从事后总结来看，中美关系的发展反映了两个基本事实。首先，中美双方均无意愿或未准备好与对方彻底脱钩，尤其是美国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尽管特朗普在 4 月 2 日表现出极大的决心，甚至将其称为“解放日”，并在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声称这是美国的长期既定方针且不会改变，但从最终结果及政策变化来看，他实际上随时都在调整立场。这表明他并未真正准备好与中国彻底脱钩。其次，所谓的加征关税提高至 145% 的举措，完全是情绪驱动的结果，缺乏任何理性计算。特朗普因中国采取报复措施而选择反报复，进而将自己置于无路可退的境地，这完全是误判所致。此外，曾有国内部分人士认为这是特朗普的阴谋，尤其是在美国豁免其他国家关税之后，许多人将其视为特朗普

的算计。甚至特朗普政府内部一些人也声称这是他们的计划与计谋。然而，从实际结果来看，这既无阴谋也无计划，实际上是特朗普的政策失控，导致局势完全脱离了预期轨道。

第二，关于彻底脱钩或短期内硬脱钩对美国的冲击，至少从短期来看，其影响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美国的承受能力以及特朗普的承受能力均低于我们的预期。原本预期特朗普会至少坚持数月，甚至半年，毕竟其在加征关税之前曾言辞强硬，按理应观察一段时间后再做调整或进行谈判。然而，结果出乎意料，美国仅在短短一个月内便难以支撑，显示出特朗普的脆弱性。核心问题在于美国国债市场出现了超出预期的动荡，同时股市和汇市也受到波及，但国债市场的影响更为关键。这种动荡直接影响到美国政府的施政以及下一阶段财政赤字的扩大。相比之下，股市的波动对特朗普政府影响较小，甚至特朗普个人可能从中受益，例如通过炒作预期获取利益，其家族和朋友也在美国股市动荡中获利。然而，国债市场则不同，特朗普无法控制其走势，且其政策的落实需要美国国债市场的支撑。此次所谓的“大而美”的减税法案将进一步扩大美国财政赤字，特朗普也因此更加依赖国债市场的稳定。

二、中美贸易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

从短期来看，美国政府的决策，尤其是特朗普的决策，并非基于宏观指标，而是关注一些短期且具体的、对其利益有直接影响的指标。例如，美国GDP的微小波动对他而言并不重要，但国债和通胀可能对其基本盘产生的冲击却值得关注。尽管基本盘的冲击尚未显现，但国债市场的冲击已经表现得非常迅速。因此，特朗普迅速调整了对中国的关税政策，这实际上是由于他对美国国内形势以及中国反应的误判所致。需要明确的是，不应以阴谋论来解读特朗普的行为。特朗普并无阴谋，也无法实施阴谋。从其迫切的心态来看，在中美元首对话之后，双方在技术层面也开展了进一步讨论，特朗普便立刻宣布将于6月9日在伦敦举行中美谈判，其急切程度远超我国。

特朗普的多变性已广为人知，他本人也强调自身的灵活性。当前，他迫于压力做出调整，然而，未来情况难以预测。一旦当前的压力在未来某一阶段得到缓和，尤其是在中美关系的暂停期内，暂停期结束后，其政策走向将难以确定。因此，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希望对其政策在未来中长期内，至少在其任期内可能的选择做出判断。

在4月2日“解放日”关税宣布前，判断特朗普关税可能涉及三个方面：**一是10%-15%的基准关税**。特朗普认为美国整体关税水平较低，且需通过提高关税扩大财政收入，10%左右的关税更多体现财政属性，对产业保护作用有限但仍有一定影响，因此该关税加征具有较高可能性。**二是针对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点产业加征25%-30%的“232”关税**。此类关税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已开始加征，此次更多涉及加征范围的产业调整问题，故加征可能性较大。**三是对与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加征25%-30%的对等关税**。然而，4月2日公布的关税政策远超预期：关税加征对象覆盖所有国家，不仅包括对美贸易顺差国，还涉及众多中小国家甚至部分对美贸易逆差国；部分发展中国家（如莱索托、柬埔寨、越南）的关税增幅甚至高于中国，政策力度超出预判。

经过近期的发展，特朗普似乎又呈现出回归加征关税模式的迹象。美国与英国目前仅达成了初步协议，尚未签署最终协议。从这一协议来看，美国计划保留对英国的10%基础关税，尽管英国是贸易逆差国。此外，美国的“232”关税仍在继续实施，且尚未明确英国是否会获得豁免，相关谈判仍在进行中。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及其他关税政策作出了否定性裁决，这进一步增加了特朗普未来关税政策演变的不确定性。法院否定了特朗普针对芬太尼的关税政策，以及其基准关税、对等关税和针对中国的报复性关税。法院认为，美国总统并无权实施这种全局性、普遍性的关税措施。《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未授予其此类授权，仅允许针对特定国家、特定产业或特定产品加征关税。因此，“232”关税和“301”关税虽可实施，但不能采取全局性加征关税的方式。

特朗普目前已提出上诉，联邦巡回法院将作出裁决，不排除其继续上诉至最高法院的可能性。从当前法学界人士的分析来看，特朗普政府败诉的可能性较大，甚至可能在最高法院亦面临败诉局面，原因在于此争议直接涉及美国宪法对总统与国会授权的问题。若特朗普政府败诉，其关税政策调整存在较大可能性：一方面，可能提高或扩大“232”关税的征收范围——目前钢铝关税已从25%提高至50%，若法院限制其征税权力，不排除进一步提高现有税种税率；另一方面，可能扩大征税产品范围，从钢铝、半导体、汽车、制药等领域扩展至更多产业和产品。

另一种可能的国家层面关税加征方式是通过“301”条款，类似于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情形。其逻辑是基于该国家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因而认为应

对其加征关税。然而，“301”条款的实施需要一定的调查程序，原则上为期一年，但实际操作中该时间可以调整，甚至可能在三个月内就得出结论。这种灵活性使得难以对其形成有效制约，且不排除类似情况再次发生。事实上，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相关调查仅历时七八个月便得出结果。因此，调查程序的时长并非关键问题，因此推测未来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当前存在的问题是 10%的基准关税能否保留。根据现有法院裁决，该关税难以加征。因此，特朗普关税政策的结构与实施方式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从可能性分析，“232”关税可能呈现全球普遍加征但针对特定产业的特征；“301”关税则可能针对特定国家实施全产品加征。就中国而言，美国对中国已实施“301”关税（覆盖约 60%以上的税号），且该措施目前仍然有效，未来不排除进一步扩大加征范围的可能性。

从下一阶段中美关系来看，双方仍需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未来可能出现以下几种情况：首先，芬太尼关税可能会被取消，因为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可能会裁定其违法。其次，中美双方可能会在芬太尼问题上开展合作，通过合作形式促使美国取消相关关税。然而，“301”关税的范围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具体扩大程度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决策。尽管美国目前对部分 IT 产品给予了豁免，但从现状来看，关税范围仍有扩大的可能性。如果范围扩大，那么在现有“301”框架下加上其他关税，平均关税率已达到 20%，再加上 10%的基准关税，总关税率约为 30%。如果美国通过“301”条款进一步提高对中国的关税，那么 10%的基准关税可能会被取消，但最终关税水平仍可能维持在 30%左右。这一关税水平仍将高于大多数国家，中国可能仍将是美国征收最高关税的国家。相应地，中国也会采取反制措施。

三、全球经济格局的演变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在当前形势下，从中长期来看，中美贸易发展的趋势是进一步脱钩，脱钩的范围和程度必将持续扩大。尽管在过去七八年中，中美贸易数据在绝对值上看似尚可，但从相对重要性来看，美国对中国以及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均在下降，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均是如此，这正是脱钩的表现。因此，中美战略脱钩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未来中美之间再谈互利共赢或扩大合作将极为困难，更多问题或主要优先次序应聚焦于管控风险与冲突，而非扩大合作，因为扩大合作已不现实。因此，基本方向仍是进一步脱钩。“二区

化”观点是一个很好的表述，也可称为双核驱动。未来的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可能呈现双核驱动的格局，中美之间的贸易联系很可能从过去较为紧密的直接联系，转向一种更扩散化的间接联系，这种趋势已经显现。

在中美脱钩的过程中，通过第三方维持甚至扩大联系的现象仍然存在。从增加值的角度计算，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仍在提高，但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第三方中转实现的。当前所谓的“连接国”地位日益重要。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优势。尽管我们并不愿意看到中美关系从过去的紧密联系走向脱钩，但从某种较为乐观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适当或局部的脱钩在政治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政治角度来看，中美双方都有减少对对方过度依赖的需求。从战略层面而言，双方至少存在竞争关系，甚至可能被定性为冲突或对抗。这种对对方的疑虑是可以理解的，属于战略层面的焦虑。从某种程度上说，降低相互依赖程度可以缓解这种焦虑，甚至可以说“距离产生美”。双方通过适当拉开距离，可能会获得更大的舒适感，各自都需要一定的舒适区。在过去帝国主义体系中，这被称为势力范围；而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各国需要在自身周边建立一定的舒适区。

中美之间不会彻底脱钩。特朗普曾将关税提升至 150%至 160%的水平，但最终选择退缩。既然特朗普都不敢彻底断绝中美经济联系，其他人更不敢轻易尝试。因此，只要不发生热战或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中美之间就不会脱钩。中美之间的经济大循环仍将继续，尤其是从双方的经济结构来看，这种相互需求具有基础性特征：中国是产能供应方，美国是需求方，这种供需结构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尽管大家都在讨论中国向内需转型，但转型的具体路径以及所需时间难以预测。在转型方式上仍存在分歧，且涉及诸多基础性改革，难以一蹴而就。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美之间的经济大循环仍将持续，但其方式可能更多地通过间接途径而非直接联系实现。从经济角度来看，这种间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因为更多国家将参与到这一经济循环中。这与 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带动相关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有些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当时是地缘冲突的缓和创造了更多机会，而如今则是地缘冲突的加剧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新的机会。因此，许多中间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到这一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美国无法强迫其他国家选边站或与中国脱钩，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没有任何国家愿意做出这样的选择。尽管美国自认为是最大的市场，拥有较大的话语权和谈判筹码，但

中国作为最大的供给方，尤其是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最大供应者，同样具有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可以相信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从这个角度来看，中美双核驱动的世界经济大循环仍将存在。其他国家，包括欧洲等，也会以其他方式参与其中，世界经济循环仍然可以维持运转。虽然与过去相比，其效率可能有所降低，且从全球视角来看，当前世界经济的驱动力略显不足，但总体而言，世界经济循环仍可保持基本稳定。

尽管今日讨论的主题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但在当前形势下，贸易与投资的融合以及贸易与投资的双重驱动将显得更为重要，尤其是对中国而言。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热情高涨，但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担忧和限制。从数据来看，中国对外投资金额（OFDI）与GDP的比值并未显著提高，这表明中国在对外投资方面仍具有巨大潜力，且有必要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从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这也是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路径。然而，在对外投资以及产业链对外转移的过程中，风险管控至关重要。对产业链的控制以及对技术的适度管控是必要的，这与其他国家的做法一致。中国在这一方面也具备充分的能力。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资本输出与资源能力输出能够更好地带动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促进世界经济的整体增长。当前，无论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还是其他各类贸易争端，其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减速。世界经济“蛋糕”扩大的速度正在减缓，各国不得不在有限的存量中相互竞争，这导致矛盾愈发激烈。从中国的角度而言，资本输出与能力输出能够更有效地帮助相关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从而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而不仅仅是依赖商品输出与贸易。随着中国在全球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贸易领域确实产生了一些冲击和摩擦。因此，中国需要调整参与全球经济和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模式，从过去偏重贸易，转变为贸易与投资并重。从制度层面来看，当前的重点不再是推动关税下降或贸易自由化，而是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突破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剩余的高关税产品大多是各国最为敏感的领域，其规模也相对较小。并非所有产品都需要实现百分之百的零关税或关税下降，某些产品在某些国家保留一定关税对整体影响不大。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各国国内规制的协调，是更为重要且优先的工作。事实上，中国与欧盟曾达成过相关协定，只是尚未生效。未来，中日韩自贸协定虽已谈判多年但进展缓慢，或许可以更多地考虑投资协定的升级与扩展。此外，中国与

其他国家，包括非洲、中亚等地区的许多双边投资协定已较为陈旧，亟待升级，尤其是在扩大投资自由化承诺和开放水平方面。

对中美关税摩擦及对等关税的理解

徐高 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徐高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06期）上的发言

一、中美关税摩擦的背景与经济逻辑

中美关税摩擦及对等关税到现在为止远不能说尘埃落定。中间波折较多，最近习总书记又应邀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谈话，预示着关税未来前景可能有所改善。但是，特朗普个人捉摸不定，现在华尔街非常流行的一个交易策略叫做 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特朗普总是要认怂”），他出台政策后很快又调整，导致市场波动比较大。这种情况下，跟踪最新形势的变化是重要的。但是从经济角度探讨关税变化和关税摩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把握住短期事件背后的长期经济的因素。引用恩格斯在 1890 年说过的一段话：“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也就是说，经济和上层建筑包括思想层面、政治层面的东西对历史发展都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但最后恩格斯指出：“这里表现出的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作用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

简而言之，从历史的短期视角来看，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然而，若能把握经济运行的规律，便能在众多偶然事件背后发现某种必然性。接下来将重点阐述美国推出对等关税背后所隐藏的逻辑，进而为分析美国下一步可能的政策走向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提供参考。

关于对等关税，已有学者进行过分析，其过程具有戏剧性。起初，关税加征幅度较高，但在 5 月 12 日日内瓦经贸会谈后，美国政府临时大幅降低了该关税。自 4 月 2 日对等关税实施以来，美国政府的姿态较为明确，其意图是通过该关税措施来压缩美国整体贸易逆差。

美国代表办公室自行公布了对等关税税率的计算公式。右图展示了美国对全球 57 个国家征收对等关税的税率水平。图中横轴表示美国对别国的贸易逆差与美国从该国进口额之比，

纵轴为对等关税税率。由此可以看出，二者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美国对某国的贸易逆差规模越大（即贸易逆差与从该国进口额之比越高），美国加征的关税税率越高。按照美国的解释，其征收对等关税的原因在于，美国认为自身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不平衡完全是由别国对美国设置的关税或非关税贸易保护壁垒所致。因此，为了平衡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壁垒，美国决定加征关税。然而，这一逻辑在经济学上是不成立的。

二、美国贸易逆差的根源与影响

事实上，从关税的整体情况来看，在过去四十多年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的贸易赤字规模确实较大。图中展示了一些主要经济体的贸易赤字或逆差（横轴）占世界 GDP 的比重。长期以来，全球几乎唯一一个长期贸易逆差国是美国，而中国、一些亚洲国家以及中东石油输出国则长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因此，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全球形成了一种“美国赤字，别国顺差”的失衡局面。在这种格局中，美国为全球提供了贸易赤字，换言之，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大多来源于美国的赤字。然而，这种全球失衡的根源并非如美国所言的别国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从简单的经济逻辑来看，一个国家是处于贸易顺差还是贸易逆差，主要取决于该国的内部经济平衡。

从国民收入恒等式来看，公式较为简洁：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等于 GDP 减去国内内需（消费与投资之和）。换言之，若一个国家存在贸易赤字，则表明其 GDP 小于国内内需。由于内需超过国内产出，该国需通过贸易赤字进口商品以弥补国内供给不足。相反，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其 GDP 高于国内内需，因此需要通过贸易顺差将国内富余的产出输出到其他国家。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或逆差主要取决于国内内需与国内供给之间的平衡。

可以设想，一个国家即使出口竞争力很强，但如果其国内内需更为强劲，仍可能是一个贸易逆差国；反之，一个国家即使出口竞争力较弱，但只要其国内内需相对较弱，也可能是一个贸易顺差国。因此，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或逆差程度与其出口竞争力，或别国对该国施加的贸易保护程度，在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的核心原因在于其国内内需过剩，超出国内产出水平，这是其贸易逆差的根本逻辑。

该公式还可进一步变换，以提供贸易顺差的另一种解读。对于任何经济主体而言，储蓄等于总收入减去总消费，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国家层面。由于一个国家的总收入基本等同于其 GDP，因此 GDP 减去消费即为该国的总储蓄。由此可得，贸易顺差等于国家的储蓄减去投

资。换言之，若一个国家为贸易逆差国，则意味着其国内投资规模超过国内储蓄规模，需借助国外储蓄来弥补国内储蓄的不足。相反，若一个国家为贸易顺差国，则表明其国内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规模，因而需通过贸易顺差将其剩余储蓄输出到国外。这才是决定贸易顺差与逆差的根本因素，与该国的出口趋势并无必然联系。

美国在过去四十余年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内需过剩。从历史时点来看，美国在二战结束后至 1971 年 8 月 15 日期间，全球货币体系遵循布雷顿森林体系。在此体系下，美国承诺 1 盎司黄金兑换 35 美元，并维持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1970 年之前黄金价格保持稳定，而美国在 1971 年前是贸易顺差国。然而，1971 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这意味着美国不再受黄金约束，可以大量发行美元。美元作为一种价值符号，是美国无成本创造的。二战后，美国成为全球主导力量，美元因此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工具，全球对美元存在较大需求。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开始大量发行美元，导致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飙升，这反映了美元相对黄金的贬值以及美元发行量的扩张。这种美元发行量的增加使得美国国内经济主体手中多出了可用于购买别国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符号，从而推动了美国国内需求的上升。从个人角度看，额外获得一笔资金自然会增加支出。因此，美元的大幅扩张导致了美国国内需求的扩张，进而引发了美国贸易赤字的上升，并使其在近年来持续保持较高水平。综上所述，美元的发行机制才是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从美国长期贸易逆差的状况可以发现，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无疑是受益国之一。美国凭借其无成本创造的价值符号——美元，从其他国家换回了大量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表现为美国的大规模贸易赤字。因此，尽管美国对全球化存在诸多抱怨，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它无疑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然而，事物具有两面性，在受益的同时，美国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美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现象。美国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从 1970 年的 24% 下降到 2024 年的 10%，这一变化与美元的大量输入输出密切相关。其次，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的衰落，更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制造业无法与美元出口业竞争。美元是美国最具竞争力的“出口品”，而美元出口业，即美国的金融行业，是美国最具出口竞争力的行业。

当某一行业的出口竞争力极强且能轻易获利时，其他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盈利的行业往往难以发展，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荷兰病”。美国因美元的特殊地位而患上了“荷

兰病”，进而导致其制造业空心化。从长期来看，制造业的空心化对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极为不利。尽管美元是全球主要的支付工具，而其全球认可的基础在于美国在经济、政治和综合国力上仍是当前全球最强的国家，但可以合理推断，一个产业空心化、制造业衰退的国家，难以长期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因此，尽管美元的对外输出使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获取了全球利益，但也使美国的霸权面临明显危机。这是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一重挑战。

第二重挑战是其国内收入差距的扩大。自 1990 年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国内工人薪金总额与企业利润呈现出明显的分化趋势：工资总额占比持续下降，而企业利润占比显著上升。这一现象反映了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内劳工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进而导致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例如，特朗普能够两次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那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美国劳工阶层的支持，这也体现了美国国内阶级矛盾的加剧。反观美国国内出现众多全球化“失败者”的原因，主要问题在于美国自身。作为全球化的受益国，美国未能在其国内对全球化红利进行相对公平的分配。因此，尽管美国从全球化中获益，却在国内产生了大量全球化的“输家”，这反映出美国国内在分配机制上存在重大问题。

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制度决定了在国内进行大规模的阶级间收入转移支付存在较大困难，例如难以将过度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全球化红利转移给普通劳工。因此，尽管美国是全球化的受益国，但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其所承受的压力却在不断增大，最终导致特朗普政策的整体转向。

从逻辑上分析，特朗普的政策转向较为简单，即走逆全球化道路，试图回归到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全球化尚未开始、美元尚未大量向外输出的状态。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推行对等关税政策。尽管之前提到其阐述的理由并不充分，但从美国长期的大国发展逻辑来看，这一政策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

因此，对于美国而言，不应低估贸易战或对等关税带来的贸易摩擦的长期性。因为这实际上是美国内部深层次矛盾的一种体现。尽管短期内可能会出现特朗普时而强硬、时而软化带来的政策反复，但对等关税的实施仍然标志着过去四十年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在这样的背景下，探讨关税战对美国自身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既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如今，美国选择走向逆全球化道路，通

过抑制别国商品输入、加征关税以及减少美元向海外输出，从而获取逆全球化带来的收益。然而，美国在追求逆全球化收益的同时，也必然要承受逆全球化带来的代价。

这种代价在短期内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美国国内经济受到较大的关税冲击。例如，美国制造业 PMI 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出现了断崖式下滑。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国内债务的接续难度上升。从相关数据可以看出，美国国债规模已接近二战时期的高位。与许多人的认知不同，美国国债的可持续性主要依赖于美元的霸权地位，即只要美元仍被其他国家接受和认可，且其他国家愿意持有美元资产，美国的债务规模就可以持续扩张。然而，根据国民收入恒等式（贸易顺差=储蓄-投资，贸易逆差=国内从别国输入的富余储蓄），在过去四十多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长期保持贸易赤字，这意味着其从其他国家输入了大量富余储蓄。例如，中国等国家在获得美元后，并未立即将其花掉，而是将这些储蓄以美元资产的形式持有，并投入到美国金融市场，购买美国国债，从而支持了美国国内债务规模的上升。因此，美国的贸易逆差实际上对应着从国外输入的富余储蓄。特朗普试图通过实施对等关税将贸易逆差压至零，这将导致美国从其他国家输入的储蓄规模大幅收缩。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债规模已处于高位，而减少从别国流入的储蓄规模，将使美国国内债务的持续性面临较大问题。因此，美国的债务可持续性建立在美元霸权之上，而对等关税政策实际上对美元霸权构成了明显的威胁。

近期对等关税政策出台后，美国国内金融市场的走势十分清晰。以下是两个重要的美国金融指标：一是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国债收益率越高，表明国债价格越低，意味着更多人正在抛售国债；二是美元指数，其对应的是美国对一揽子发达国家货币的加权平均汇率。从数据可以看出，对等关税政策实施后，美国债券价格下跌，美元汇率也下跌，这表明国际投资者对美国能否维持其债务持续性存在疑虑，因此国际资金正在撤出美国。

这种资金撤出的逻辑是完全合理的。美国此前依赖从其他国家借入储蓄来维持高杠杆增长模式，然而，当其实施对等关税政策、试图减少其他国家向美国的储蓄输入时，这种模式便难以为继。因此，美国自 4 月以来国内金融市场的动荡，反映出其关税战或逆全球化道路已经开始让美国付出代价。美国是否已经充分考虑了这种代价？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特朗普政府的反复无常是可以理解的，但未来整个前景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与未来展望

当前，中国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国内内需不足是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过去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由于人口红利消失所致，但近年来的经济走势已证明这一说法并不成立。需求面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紧约束所在，要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尤其在贸易战背景下如何应对外部调整，必须从需求面入手。**内需不足的核心问题在于消费不足。解决这一问题的上策是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进而提升消费占 GDP 的比重，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然而，这一路径在调节收入分配结构方面面临较大困难，因为这不仅涉及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调整，还涉及居民、企业、政府三大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实施难度较大，需要较长时间来推进。在消费难以在短期内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情况下，外需和投资成为重要的支撑力量。2008 年之前，中国曾依赖外需，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但显然当前的经济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尤其是在对等关税政策的背景下，中国的外需面临较大压力。**因此，最终仍需依靠国内投资来稳定经济增长。**

投资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通过政策刺激投资，但这可能导致投资回报率不断降低；二是不再刺激投资，甚至打压投资，但这将导致去产能的下策局面。许多人认为，产能过剩且内需不足时，通过去除过剩产能来实现市场出清，经济便能轻装上阵。然而，这种观点在理论上过于天真，且在实践中也未取得良好效果。例如，1998 年至 2002 年中国曾尝试去产能，但未能取得预期成效。原因在于，去产能过程中，国内有效需求和产能会竞争性收缩，导致过剩产能反而增加。因此，去产能并非可行路径，中国仍需依靠政策维持经济平稳增长。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源于房地产投资的收缩。**换言之，若能恢复房地产投资的正常水平，中国经济在对外需压力时将更具底气。**只要能让房地产市场从深度衰退和大幅负增长的状态恢复到过去几年的平稳正增长水平，中国经济便能在外需冲击下保持稳定。

截至 4 月，中国经济的出口数据总体保持平稳，但从出口结构来看，4 月以来对美国出口已显著下滑，而对东盟出口则显著上升。这一变化反映出当前中国经济可能仍在经历因东南亚国家的抢出口和抢转口行为所带来的短期出口支撑。然而，这种支撑难以长期维持，未来出口前景仍面临一定压力。在此背景下，国内能否快速扩大投资规模以对冲外需减弱，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课题。

若对今年的中国经济和市场进行展望，可概括为：**在中美博弈中，中国不能输，中国市**

场不能退缩。美国发起对等关税，其自身也在付出代价。在此博弈中，任何一方退缩都可能助长对方的势力，为对方提供可施加的压力。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压力，中国必须保持经济稳定，而事实上中国拥有较大的政策空间来维护经济增长的稳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今年实现 5% 的增长目标已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相信，通过进一步加大财政宽松力度，包括对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支持，以提振投资、保障经济平稳运行，中国便能在中美博弈中站稳脚跟，并在维护经济稳定的前提下赢得中美贸易摩擦。



把脉中国经济 传递中国声音
Taking Economic Pulse, Forecasting Economic Future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立德楼1104
Add: 1104, Lide Build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9 Zhongguancun Street,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China

网站: <http://ier.ruc.edu.cn/>

微信公众号:

